

香港回歸祖國

前後

周

南



王一桃 著

當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香港
回歸
祖國
前後

周南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 周南題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尚



香港回歸祖國前後

ISBN : 978 - 962 - 278 - 283 - 9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作 者：王一桃
- 出 版：當代文藝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坳背灣街
金豪工業大廈第二座八樓H室
電話：2694 1576
- 發 行：香港青年出版社發行部
香港北角渣華道82號二樓
電話：2564 8732
- 印 刷：三和印刷廠有限公司
- 版 次：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 定 價：港幣 68 元正

香港歸祖國
詩人喜欲狂

一桃詩友新著出版題句

臧克家



狂討自回

天力系里雄風

鼓征帆

一挑
之
雅
家

子
劉
繼
明

愛國愛港的真實寫照

——王一桃《香港回歸祖國前後》序

張浚生(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王一桃先生將他的香港紀事文學作品，以《香港回歸祖國前後》為書名結集出版，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香港問題和我國的近現代史緊密聯繫在一起。1840年英國以其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對中國實行侵略，販銷鴉片毒品，前後以三個不平等條約，侵佔了港島、九龍和新界。自英國強迫當時腐敗的清政府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始，帝國主義列強就不斷入侵，一步一步瓜分中國，使我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救國圖強一片心」(吳玉章詩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為拯救祖國的危亡，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前仆後繼，浴血奮鬥，1949年終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建立了自主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通過中英之間的和平談判，解決香港這個歷史遺留的問題，洗刷中華民族曾經遭受的百年恥辱，這只有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才有可能。而以「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香港問題，這在世界政治史上更是一個創舉。對此凡是熱愛祖國的人莫不熱情歡呼，只要有可能都會積極地為之作出自己的貢獻。

王一桃先生年輕時在海外就受到過祖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以及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大批偉大的愛國主義作家、詩人的思想的熏陶，積極投身於愛國事業。為此在英殖民地馬來亞還受過牢獄之苦。但這又更鍛煉了他的堅強意志，更加激

發了他的愛國熱情。他回到祖國之後，即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學習和工作，為新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即使曾經遭受過不公正的待遇，愛國之心始終不變。

隨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到來，香港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在鄧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我國政府明確地提出到 1997 年 7 月 1 日必須收回包括九龍、新界在內的整個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同時又高瞻遠矚地提出了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偉大構想，並據此制訂了一系列具體方針政策。通過與英方長達兩年的多輪談判達成了協議，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明確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收回香港。

對此，廣大香港同胞莫不歡欣鼓舞。當然也有少數人存一定程度的懷疑，甚至也有人持反對的態度。這在經受了一百多年殖民統治的香港並不奇怪。

自 1985 年 5 月起，香港進入了過渡期。雖然中國政府對回歸後的香港的方針政策非常明確，而且這些基本方針政策也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作了宣示，還通過制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將這些方針政策，以國家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而且在過渡期內就以此方針政策來指導和處理我國政府對香港的有關工作，但是香港的過渡期並不平靜。除了有的是難以避免的客觀原因，如 1987 年 10 月的股災等，許多則是來自人為的干擾。

英國將香港這個地區在此實行了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並在香港同胞的努力下建設成相當繁榮的一個城市交還給中國並不是甘心情願，而是無可奈何的。他們在過渡期為平穩過渡設置障礙，作出各種部署妄圖在香港回歸中國後還能在最大程度上維持他們在香港獲得的利益；有些人雖然身為中國人，但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者豢養，對於將要失去靠山既恐慌又不滿，也不時出來干擾平穩過渡；還有一些人因為長期受到殖民統治的教育，國家

民族意識淡薄，對祖國內地缺乏全面了解，甚至還有誤解，在過渡期內也有一些疑慮；至於本來就是企圖以香港為基地對我國進行破壞搗亂的政治勢力，當然更不會就此罷手。儘管如此，形勢仍比人強。由於我國政府對香港方針政策的正確，由於我國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健康、穩定、持續的發展，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改善和提高，國際地位和影響不斷上升，加上我國政府對港進行有效的工作，香港愛國同胞的不斷努力，香港在過渡期內雖然歷經風雨，但整個形勢一年比一年好，困難一個一個被克服，障礙一個一個被排除，經濟不斷繁榮發展，社會持續保持穩定，最終達到了平穩而順利地過渡。一個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終於在1997年7月1日正式成立。

經受英國一百五十六年殖民統治、飽經風霜的香港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此香港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但是歷史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總是波浪式前進的。回歸十年由於歷史的、現實的、內部的、外部的各種原因的影響，香港也歷經風風雨雨，但是有《基本法》的指引，有祖國的關心和支持，在勇於克服困難的香港同胞的努力下，今天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更加成熟，更加繁榮安定，更加生氣勃勃的香港。「南海珠還恰十年，神州豪氣更無前」(周南詩句)。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無不感到無比高興和自豪。

王一桃先生自內地來到香港之後，經歷了香港回歸前後這一重大歷史時期。而對這一令人振奮的歷史，他以一貫的愛國熱情，拿起他的如椽之筆寫了大量的詩篇和文章，既熱情歌頌我國政府對收回香港的決策和採取的正確的方針政策，衷心禮讚我國開放改革總設計師和處理香港問題的總舵手鄧小平，宣傳我國政府對香港的有關政策，以使存疑慮和擔心的人對這些方針政策有正確的認識，釋疑解惑，樹立信心。同時又以愛國詩人和作家的

政治敏感和責任心對那些力圖干擾香港平穩順利過渡和有意在特別行政區設立後還力圖製造事端的行徑予以揭露，對一些奴顏婢膝，投靠外國勢力，甚至到國外去歪曲我國對港方針政策，醜化自己祖國，乞求外國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的人進行無情的鞭撻！這些在他現在結集出版的作品以及以前出版的許多詩集和文章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王一桃先生說他遵命而寫作，他的作品是遵命文學。遵時代之命，遵人民之命。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作品都是遵命而作。遵命，可以是自覺的，也可以是自發的。遵命的「命」可以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有形的是指確有人「命」他的，無形的是因為使命感而自「命」的。這種使命感是來自他要為人類的生存和幸福，要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要為民族的獨立和興旺，要為世界的和平和安寧，自覺地承擔起歷史的使命。魯迅先生曾自認其作品是遵命文學，這並非是說他是奉誰的命令而寫作，而是他自覺地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而寫作。

曹丕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作，詩歌合為事而作。」柳宗元說：「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清人劉熙載說：「詩品出於人品。」朱自清說魯迅的雜感是匕首、是投槍、也是詩。王一桃先生以他特有的旺盛的創作熱情，和熾熱的愛國情懷，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問世。他以筆作刀槍，作畫筆。作刀槍是為了戰鬥，作畫筆是為了歌頌。他的作品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這裏收集的他在香港回歸前後的文章和作品是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其愛國愛港的真實寫照。

目 錄

本書題名(周南)

題詞(臧克家、劉白羽)

愛國愛港的真實寫照

——王一桃《香港回歸祖國前後》序(張浚生) 1

中共對香港的既定方針 8

文化人士的南下和北上 12

四十年代，我已嚮往香港 16

通過香港更加親近祖國 20

我是怎樣植根於香港的 24

1957，我曾涉足灣仔.....27

五十年代·香港·葛量洪 30

六、七十年代的幾個「時代」 33

1980：來得正是時候.....36

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報到」 39

應邀出席 80 年國慶酒會 42

主動聽從將令作遵命文學 45

詩作得到李菊生讚賞.....49

下維多利亞海作「經濟人」 52

「下海」旨在為日後的創作 55

我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書 58

參與《香港概論》一書撰寫 61

在香港，我搬了三次家	64
香江，流過我這赤子的影	66
「香港問題」終於上了議程	74
周南「受命於危難之際」	77
周南重申：「我只有一條……」	80
中國詩人外交家不同凡響	83
為《周南詩詞選》寫評論	86
擁有寫作的空間和時間	90
再次聽從將令謳歌香港	93
誰令香港文藝生生不息	96
香港回歸前的文學藝術	99
從過渡到回歸任重而道遠	106
我何以要寫《台階與舞台》	109
同彭定康們論民主自由	112
香港：移民的潮起與潮落	115
作《1997：我的回答》緣起	118
英國人給香港帶來後遺症	121
接受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專訪	124
給《星洲日報》寫香港專題	131
說說我心目中的香港	134
為火鳳凰與真善美禮讚	137
是時候了，讓我來講香港的故事	143
回歸日：「一覺醒來，生活如常」	146
寫香港回歸後第一份「檔案」	149

為香港三年風雲作證	152
《基本法》頒佈 14 週年感賦	156
此生有幸一睹鄧小平	159
我為什麼要歌頌鄧小平	162
他為「香港問題」劃上完美句號	165
我怎樣寫《你，早已來香港》	168
香港新華社最動人的一幕	171
從外交部來的兩個社長	174
創立香港文藝家協會	177
香港和祖國的文藝情緣	182
香港，化成我一首首城市詩	186
唱出了香港六百萬人的心聲	190
「香港，東方的明珠，中國的！」	193
就為香港回歸這一刻	196
「一國兩制」的見證者和實踐者	199
和諧——香港回歸後的最強音	204
十七大進一步明確香港發展方向	208

從山重水複到柳暗花明

——《香港回歸祖國前後》結束語	212
-----------------------	-----

附錄

我在香港回歸前後的詩作	221
-------------------	-----

中共對香港的既定方針

1948年6月，在我僑居的英殖民地馬來亞，實行了史無前例的「緊急法令」，一夜之間，馬共及其領導的工、青、婦組織全被取締，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退伍同志會也被迫轉入地下，和英帝國主義展開了浴血的鬥爭。過了半年，即1949年1月，在我心嚮往之的香港，唐寧街十號的英國內閣竟出人意料地擬定其「香港緊急防衛計劃」，企圖擴建馬來兵團，以「增援香港」。當時港督葛量洪聲稱，在全港近二百萬人中，支持港英政府的包括警察部隊和公務員在內人數不會超過一萬人。於是5月26日，英內閣會議批准了這個計劃，從而使香港英軍增至四個旅。英軍抵港後先後於9月、10月和12月分別在港島、九龍、新界舉行了軍警聯合彈壓暴動的演習。與此同時，又採取一系列措施來對付中共在港的社團和廣大愛國群眾。

1948年對香港來說，可謂多事之秋。雖然，整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勢對香港並沒有什麼威脅，但英國人對香港能否維持現狀仍憂心忡忡。1948年12月當淮海戰役的勝負已定，遼沈戰役已告結束，平津戰役即將開始，英國外交大臣貝文於9日向內閣提交其備忘錄，一方面希望香港現狀能繼續維持下去，一方面又不能不考慮中共收回香港的可能性。他甚至還以「生活在火山口上」來作比喻，認為即使中共不收回，也可能採取非軍事手段來挖港英當局的牆腳，諸如煽動工人罷工使香港資本主義的經濟陷於癱瘓，從而動搖港英當局的殖民統治。

到了12月13日英內閣會議對中國國內形勢發展進行首次討論時，貝文這種「最大的希望可能在於採取保留立足點」的建議雖獲得認可，然而馬來亞民族解放運動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節節

勝利的鼓舞下迅猛發展，又給英國殖民政府造成無可名狀的恐慌。不久，即 1949 年 3 月 5 日，殖民大臣瓊斯向內閣提交了「關於馬來亞和香港局勢的備忘錄」，聲稱他同英軍遠東司令和香港總督等磋商後，認為短期內香港可能面臨三個方面的威脅：一是左派工會可能在香港內部製造騷亂，二是大量中國難民湧入，三是中共組織的游擊隊可能從外部入侵。而目前香港僅僅有一個旅的兵力，云云。

當時我還在馬來亞，怎麼也想不到，馬來亞問題會同時和香港問題一起提上英內閣會議議程。馬來亞「緊急法令」實施後，形勢十分嚴峻，整個半島都被戰爭的陰雲所籠罩，而且這種陷入熱帶森林沼澤中的戰爭不知要打到哪年才能結束，香港怎麼會步其後塵，重蹈覆轍呢？然而這些神經過敏的老牌殖民者竟然策劃其想像中的「香港保衛戰」，而且還從馬來亞叢林中把參加反「恐怖分子」作戰的廓爾喀兵調到香港。其實這廓爾喀兵正是地道殺人見血的恐怖分子。港英當局此舉和馬來亞英殖民當局如出一轍。他們在邊界地區部署兩個旅、一個坦克團和大部分炮兵，在九龍和新界其他地區部署一個旅，隨時作增援前線守軍的準備。還有一個旅則派作協助警察以「維持治安」，實際上是要「鎮壓暴亂」。這樣總兵力就從原來的五千人驟增至五萬，而且港英政府還提出空前龐大的 1949 - 1950 年度預算，總計達到一億八千零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元之鉅，其中二千六百萬元就是為擴充警察實力和建立防衛軍的專款。似乎戰神已降臨維多利亞港，烽煙開始瀰漫港九新界！

其實，這完全是庸人自擾。從中國人民解放軍 1949 年 1 月解放北京 5 月解放上海，特別是在解放南京之後百萬雄獅下江南，以摧枯拉朽之勢一直推進廣東省，只要一跨過深圳河，香港即可完全收復。但軍令嚴明的解放軍到此却按兵不動。據 Robert Cottell 在他《香港的終結——英國撤退的秘密談判》一書寫道：

「當時解放軍的司令員曾傳話給予英國人，說他們的任務是維持和平並準備恢復貿易和重開廣州至九龍的鐵路」中共的這一重大決策和果斷行動令武裝到牙齒的英殖民者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如果他們沒有健忘的話，那麼他們應該對 1946 年 12 月 9 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三位西方記者的談話還有印象：

當哈默問「在香港問題上中共的態度如何」時，毛澤東坦然回答說：「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解決。」（詳見《毛澤東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7 頁）

還有 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

「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

「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決的，應提出解決，其尚不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

「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無害或無大害者，即使易於解決，也不必忙於解決。」

「凡問題尚未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

「總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們對於原則性與靈活性應掌握得很恰當，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詳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8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4 頁）

根據這一方針政策，香港問題在當時屬「尚不能解決者」，故「應暫緩解決」。同時也屬「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自然「不必急於去解決」。特別是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和敵我雙方的矛

盾決定了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而這，正是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和中國人民眼前利益的統籌兼顧，政治原則的堅定性和鬥爭藝術的靈活性的完美結合。

為此，本港的《文匯報》、《大公報》多次發表社論，闡述中共中央這一方針政策：

「中國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革命迄今為止，從沒有一言一動牽涉到香港。」（《文匯報》，1950.2.9）

「香港應該與中國大陸成立良好的聯繫，儘量發揮其貨物集散交通銜接的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榮。」（《大公報》1950.2.17）

「英國和香港當局」應「一方面站在平等的立場來重建外交關係，一方面認清在遠東美英利益的分歧，擺脫美蔣挑撥離間。」（《文匯報》1950.5.6）

「本港對新中國，不但有生意可做並且前途至可觀。」（《文匯報》1950.5.21）

「香港政治家應拿出勇氣，面對現實，與新中國人民當局，共把中港關係建立在一個平等，互惠與互相尊重的新基礎上。」（《文匯報》1950.6.25）

而在這之前，也就是1949年8月，香港工委喬冠華已向《文匯報》總編輯傳達了周恩來給南方局的指示：我們現在沒有收回香港的打算，香港工作的重點是拉英反美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要保護當地人民的權利，保護中共在香港的機構。1950年廖承志又一再申了中共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一政策。

事實證明，香港半個多世紀來能繁榮安定，其主要原因乃在此一既定方針。

文化人士的南下和北上

1945 年抗戰勝利後，衆多進步文化人從大後方返回上海、廣州等地。中共中央根據當時的形勢和任務，利用香港特殊的戰略位置，決定「以香港爲中心」，指導城市工作，推動民主運動。到了 1946 年廣州國民黨當局鎮壓民主運動，隨後又在上海、南京等地迫害進步文化人士，周恩來部署一大批內地知識分子南下香港。周而復在其《往事回首錄》中寫道：重慶的、上海的、廣東的文化界著名人士幾乎都來了，『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極一時之盛。……』可以說，這是全國文藝界著名人士在香港大集會（第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其陣容、聲勢和影響遠遠超過第一次。」

就我所熟悉的文學界來說，就有郭沫若、茅盾、葉聖陶、柳亞子、鄭振鐸、蔣牧良、臧克家、蕭乾、何其芳、林默涵、袁水拍、戴望舒、葉靈鳳、宋雲彬、孟超、胡風、鄒荻帆、呂劍、陳殘雲、華嘉、樓棲、林林、杜埃、周鋼鳴、林煥平、司馬文森、聶紺弩、章泯、于逢、周而復、端木蕻良、黃秋耘、黃寧嬰、胡明樹、秦牧、紫風、秦似、韓北屏、蘆荻、易鞏、歐外鷗、馬寧、力揚、葛琴、沙鷗、楊晦、柯靈、吳祖光、陳白塵、徐中玉、石方禹、馮英子、劉逸生、洪邁、黃慶雲、夏衍、邵荃麟、于伶、陽翰笙、以群、蔡楚生、歐陽予倩、史東山、張駿祥、李門、顧仲彝、符公望等一百多人，加上其他新聞出版界、政治經濟學界、文化教育界、電影戲劇界、音樂舞蹈界、美術攝影界，至少不下一千人。

而中共和各民主黨派人士合辦的新型大學達德學院則成了「民主搖籃」、「革命熔爐」。早在 1946 年秋，董必武即邀陳